

春风文艺丛书·



阿玛蒂”的故事

胡小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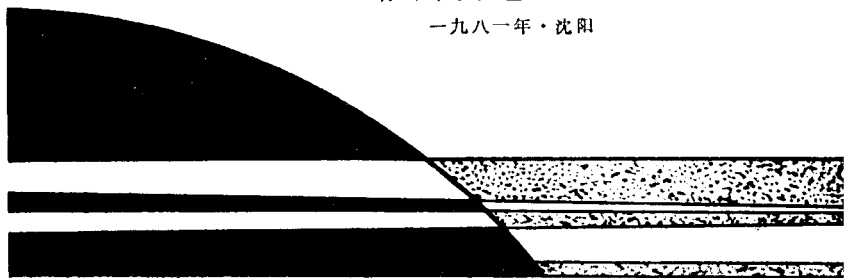
· 春风文艺丛书 ·

“阿玛蒂”的故事

胡 小 胡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沈阳



“阿玛蒂”的故事

胡 小 胡

*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大连印刷一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960 $\frac{1}{32}$ 印张: 6 插页: 2

字数: 94,000 印数: 52,001—68,500

1980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2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58·540 定价: 0.45元

出版说明

这是一部描写文化大革命中对男女红卫兵悲剧命运的中篇小说。作者以一把名贵的小提琴“阿玛蒂”为线索，讲述了一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，真实、生动地揭示了那个动乱年代的社会生活，比较典型地表现了一代青年的迷惘、思索、觉醒和抗争。

作品最初发表在《春风》文艺丛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，这次出版作者作了某些补充和修改。

我给她唱赞歌，
我给她唱丧歌。

我为命运痛苦，
我为希望祝福。

—

读者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吧。说起那些叱咤风云的年轻人，他们的形象是同整整一个时代相联系的。红卫兵运动是个潮流，不管你赞成也好，反对也好，它毕竟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现象。在那个时代，这股潮流是不可抗拒的，任何反对它的人都将陷于灭顶之灾。有人说，当年那些红卫兵们的头脑中除了“砸烂一切”和宗教式的狂热之外，没有其他思想；他们的身上除了一条武装带之外，没有其他束缚。他们穿着引为自豪的黄军装，臂戴一尺宽的红布袖标，手拿红色的《语录》本，好象其他装束全都违背革命的信条。

实际上，红卫兵各有各的面貌，各有各的性格。

我也是一个红卫兵。在那个年月里，我也激动，我也呐喊，怀着真诚的革命愿望投入洪流。一年之中，我经历的事情多过以往二十年。从学校到社会，各种人物露出嘴脸，各种变化使人目不暇接，眼花缭乱。在一天之内，真理可以变成谬误，功臣可以变成罪人。慢慢地，有些事情使我百思不可得解，激动之后往往感到茫然。不是没有一鸣惊人的机缘，但是我清楚自己的弱点，知道自己绝不会成为出类拔萃的英雄。一九六七年，在参加了各种斗争，踏遍名山大川之后，我回到北京。我看不惯学校里两派红卫兵的争斗，又苦于无所事事，就在几个同伴的怂恿下，参加了批判“文艺黑线”的工作。当时，北京几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，联合编辑了一个不定期刊物，名字叫《文艺黑线批判》，编辑部设在音乐学院。于是我们几个人到那里给刊物写几篇稿子。

那时节正是盛夏，我们在音乐学院的教学楼写文章，夜晚便在地板上铺席子睡觉。整幢教学楼没有什么人，比我们学校清静得多。可以想见，一年之前这里一定弦歌一片。如今这座大楼就象巴尔扎克笔下的夏倍上校，经历了埃洛大战，使人们无法辨识它原来的面貌了。大门的门

心板掉了好几块，走廊的墙壁横七竖八地写上了标语，画上了漫画。门厅的地板烧糊了一大片，透了窟窿。好几架被砸坏的钢琴扔在走廊里。大多数教室里的桌椅不知何时飞走了。看来打跑了乐神，留下了破庙。但是我仍然喜欢这个环境，它可以使我日夜紧张的神经松弛一下。

来到音乐学院大约一个星期，在一个月色明朗的深夜，我一觉醒来，忽然听到小提琴的声音。它好似来自天外，轻渺遥远。一会儿，它飘近了，带着万种柔情，恰似一对情人在窗下喁喁低语。多么亲切的旋律！我掀掉薄毯，悄悄走到窗前。窗外月光如水，两排高大的毛白杨沙沙作响，象是给小提琴伴奏的大管和低音提琴。整个校园在琴声和杨树声中安然入梦，进入了幻想的世界。我看了看表，正是午夜时分，随后推开房门，循着琴声走去。

这是莫扎特的小提琴曲——《E大调慢板》。

在一九六七年的北京，听到这样一首曲子，人们会大觉惊异。琴声同周围的一切多么不协调！那正是天下大乱的年月，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之中，风起云涌，波澜壮阔。各地武斗的战事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北京，北京的红卫兵“大使”在各地指挥着战斗。想一想那时的北京，这座历史

名城，正在同旧日的文明作痛苦的决裂。每一条街道，每一个店铺，每一幢房屋都改变了面貌。标语，数不清的标语，黑色的，红色的，用墨写的，用油写的，写在马路上的，写在大墙上的。古老的建筑物敲掉了额头打瞎了眼睛，新建的楼房用红砖砌出大大的“忠”字正悬当中。“联动”的勇士们刚刚打出了新的“招牌”，路人只要看到他们推出一排崭新的永久牌十三型自行车，看到他们目空一切的高傲和蛮横气派，就会躲得远远的，想起了“红色恐怖万岁”那句口号。天安门广场刚刚开过百万人大会，欢迎“旗手”的受伤了和没有受伤的部下从武汉归来。大街上刚刚通过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，愤怒的人和麻木的人相杂其间，在他们身后留下了纸旗和标语的无数碎片。几千年的文明都到废品收购站报到。在简直容纳不下的旧书库里，大本小本的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仍然保持着它们应有的分量。屈原和李白在一团烈火中化为青烟，完成了他们新的浪漫主义杰作。在小山一样的唱片堆里，贝多芬、莫扎特和梅兰芳、程砚秋聚在一起，被人们用镐头刨砸成碎片，发出同样的破裂声。“蒙娜丽莎”画上了胡子，“西斯廷圣母”是收藏者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。八大山人和石涛的真迹一钱不值，只能与废纸一同出售。因

为懂得它们价值的人都想躲开它们，不懂它们价值的人随意糟踏它们。路人的裤腿稍微瘦了一点，会被一直豁开到大腿根。烫发的妇女会被抓住剃成光秃儿。全聚德打掉了霓虹灯的招牌。丰泽园关闭了所有雅致的单间，在小院中搭起天棚，出售大碗面。只有路旁的绒花树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，一排一排站立着，开放着的粉红色马樱花，织成斑驳的彩带，却没有因为颜色不够纯正受到惩罚。

一九六七年的北京，最广泛的“民主”和最严厉的“专政”交织在一起。一方面是无所顾忌，为所欲为，一方面是噤若寒蝉，胆战心惊。也许，任何社会，任何民族都要经历一些痛苦的年月吧，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有这样的经历。

二

我从一楼走到三楼，迈上最后一阶楼梯，穿过高大而黑暗的走廊。走廊尽头的屋门开着一道缝，一线灯光泄露在走廊的地板上。我轻轻拉开门。

拉琴的是一个姑娘。

姑娘站在窗口，背对门，没有听见我的脚步声和开门声。空旷的教室里只有琴声回荡。在日

光灯下，她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，一条半旧的蓝花裙子，下摆齐膝。光着脚，穿一双浅绿色夹脚趾的海绵拖鞋。她的头发散在脑后，好象才洗过的样子，用一根红带子松松扎住。她微微偏着头夹住小提琴，露出颀长白皙的脖子。她拉弓的手臂上下摆动。

我一时呆住了，不知是应该走进房间，还是退回到走廊里去。我下意识地把手倚在门上。门却闪开了，砰的一声撞在墙上。

姑娘回过头来，
看见我张惶失措的样子。

“啊哈，是你呀！”

我更加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进来呀，干嘛站在门口？”姑娘扬开琴弓，如同一个老练的乐队指挥面对整个交响乐队。

我向前走了几步，又站住了。

“坐吧，这儿有



椅子。我知道你，你们。你们是工业大学的，来批判文艺黑线的，是吧？”

姑娘闪动着眼睛，长睫毛下的一双眼睛不算大，然而有神。

我扶着椅背站住了：

“我们才来几天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姑娘爽朗地笑了：

“知道，听别人说的。我看见你们打篮球，对不对？你们一共六个人。”

她的热情使我不再感到拘束了。

“我们一共七个，打篮球的六个。”

她点点头，似乎在想什么，然后用左手把琴压在膝头，背倚着窗台，忽然说：

“你们几个大学生……挺好。”

这句突如其来的话使我莫名其妙。我问道：

“你是音乐学院的？”

“不，附中的。”

“你的琴拉得挺好。”

“好吗？”她笑了。

“好。你不怕吗？”

“怕？嘻嘻，没关系，舅妈住在后院，她听不见的。”

我被她的答话逗笑了：

“我不是说你的舅妈。”

这一回她的笑容中露出了几分羞怯。

“你说的是……那也没关系，我又不是反动权威。不过舅妈听见可不答应。她不让我拉这些曲子。你喜欢音乐吗？”

“喜欢。你刚才拉的是莫扎特的《E大调慢板》，对吗？”我表明自己是一个够格的听众，就象大多数小伙子愿意在女孩子面前显示自己那样。

“我特别喜欢这个曲子。可惜，可惜它被禁止了。”

“可是你违禁了呀！”

“我不怕，我才不管他们那一套呢！我给你再拉一个。”

她又拿起琴。这一回拉的是萨拉萨蒂的《流浪者之歌》。这个曲子热情奔放，写的是吉卜赛人。她拉得十分认真，大抵科班出身的演奏者都没有业余琴手的那种轻薄表情。她的肩膀随着琴声轻轻地抖动。

她拉完最后一个音符，放下琴，忽然说道：

“你们批判‘文艺黑线’，这种事儿有意思吗？”

我笑了：

“你问得倒有意思。”

“我是说……比如说你吧，心里喜欢贝多芬、莫扎特，还要写文章批判他们，不是说假话

吗？我看过你们的刊物，除了骂人就是骂人，你不觉得难为情吗？”她显得又自然，又聪明，又随便。

年轻人在陌生姑娘面前露出窘态，是最糟糕的事情，我尽力摆脱这种尴尬：

“那么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”

她咯咯咯笑了：

“不干呗。打球呀，游泳呀，好玩的事情很多，你们工业大学的学生都挺会玩嘛。”

她又咯咯地笑了几声。“好了，我该回去了。”

她把小提琴放进琴盒，提在手上。

“外面很黑呢。”我说道。

“不要紧。这儿我熟悉，比你熟。”

我们关上灯，走进走廊。

“好黑呀！”她说，其实并不是害怕。

我们走到楼下。

“你家住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后面宿舍。”她轻盈地跳下台阶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忽然大胆地问道。

“苏小明。”

三

十天以后，我在运河边上又遇到苏小明。

那些日子天气实在闷热，市内的游泳池又都关闭了。那天下午，我和同伴乔建国骑自行车到阜城门外的运河去游泳。乔建国是我的同学和好友，长得矮而粗壮，性格豪爽。到了运河，水中和岸边已有不少人。我们换了衣服，走下花岗石斜坡。刚到水边，我右脚踩着一块活动的石头，扑通一声坐到水里了。

“哈哈哈哈！”乔建国放声大笑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一个女孩子也在笑。她坐在斜坡上，穿着游泳衣，双手撑起一条淡红色的浴巾，遮住头和大半个身子。我站起身，多少有点恼怒。那个女孩子把浴巾卸到肩头，对我说：

“没摔重，没摔重，哈哈哈哈……”

是苏小明。

我的恼怒顿时飞走了。

“怎么不下来游呀？”

“游啦，游累啦！”

“自己来的吗？”

“我和张少岚一起来的，她还在水里呢。她说不游五千米不上来，我可没她那个劲头。”

我看乔建国已经游远了，就朝她点点头，用我拿手的爬泳向乔建国追去。

我游了一会儿，爬上岸来。她还在那里坐着，双手撑着浴巾，一副娇慵怠惰的神情。

“捂着浴巾干嘛？”我问道。

“太阳可毒呢。”

“怕晒黑了？”

“是呵。你会跳水吗？你看那面大桥上有人在跳。去跳水吧，多好玩儿！其实我也不会跳，就会跳‘冰棍’。”

因为是野浴场，没有跳台。有几个人在五六米高的公路大桥顶上往水里跳。

“你不敢跳吗？胆小鬼。”

她腾地站起来，一扭身爬上花岗石斜坡，光着脚在岸边跑起来。她一边跑一边招呼我，淡红色的浴巾在肩头飘动。我跟着她到了桥上，她把浴巾朝我一扔，爬上栏杆，闭着眼睛跳下去，嘴里拖长声喊着“嘤……”，直到钻进水里，溅起白色的水花。

她又爬上大桥，逼着我往下跳，把头发上的水珠儿往我脸上甩。我只好跳了一次。她又跳了两次。

“瞧你那个德性，哈哈 哈哈……哈哈 哈哈……”

末了，她玩够了，对我说道：

“小程，我回家去了，张少岚在那边等我呢。”

她怎么知道我姓程？居然叫我小程——这个

丫头！

“怎么总不来练琴了？”

“我出门了，到乡下去了。”

“乡下？”

“是呵，我妈妈在乡下。”

“你家不是在音乐学院吗？”

“那是舅舅家。也许我还会去练琴的，再见！”

她一扭头跑了。跑到桥头，她用手中的浴巾向我挥一挥，转身下了坡，和张少岚手拉着手向小树林走去，消失了。我呆呆地看了老半天。

乔建国是个狡猾的家伙，我被他逮住了。回来的路上，他一个劲追问我。

“坦白吧，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坦白什么？”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你问谁？”

乔建国挤眉弄眼：

“好漂亮的丫头！你别装蒜了。什么时候认识的？”

“我们不认识。”

“不认识？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苏小明。”

“不是不认识吗？哈哈，你这个滑头。”

我回答不上来。后来，我把那天晚上的事情从头到尾对他讲了。

“色艺双绝呵！可不能放过，”乔建国哈哈笑着，“不然要后悔的！”

我可没有这样想过。

四

又过了两天，音乐学院开批斗会，我和乔建国去看热闹。礼堂里乱哄哄的，会已经开上了。台口上挂着横幅：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苏秋雨。台上坐着一排人，多数穿着旧军装，戴着袖标。台的右侧，两个年轻人押着一个白发老头。老头的胳膊被反拧着，脖子上挂着一块写着“苏秋雨”三个字的大木牌，木牌上打了两道斜叉。台上有人发言，还有人领头呼口号。这个苏秋雨是音乐学院的副院长，我过去听到过他的名字。刚来音乐学院的时候，我和乔建国曾找他谈过话，向他了解情况，对他很客气。

坐了一会儿，我无心再看下去，想拉乔建国走。这时候苏秋雨抬起头，说了一句什么话，立刻被掐住脖子按下去，又被人在腿上狠狠踢了一脚。老头登时跌倒了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从礼堂后面跑上来一个人。他三步两步跑到台前，纵身跳